

从符号学看翻译

寇福明, 吕红周

(大同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摘要: 翻译的动机和意图在于联接两种语言和文化, 在此动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变异, 如过度阐释或不足阐释导致的语义增生或衰减。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翻译元语言不但可以执行语言重新编码的中介作用, 而且统摄语用因素和文化附加意义, 从而最大化地调控阐释的度。从符号过程、符号生长、组合与聚合、编码与解码、符号模式化系统及符号域等角度解读翻译, 从而为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建构提供借鉴。

关键词: 符号过程; 符号生长; 翻译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7)02-0091-04

Abstract: The motive of translation lies in the connection of two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this dynamic process variations will inevitably appear, such as hyperplasia or decay caused by excessive or insufficient translation. Linguistic sign system as meta-language not only perform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recoding, but also considers pragmatic factors and additional cultural meanings so as to maximize the control degree of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deciphers transl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semiosis, syntagme and paradigme, coding and decoding, sign growth, sign modelling system and semiosphere, 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semiosis; sign growth;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7.02.017

1. 引言

1.1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走向

翻译研究从语言形式主义模式逐渐过渡到跨文化阐释, 即翻译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一种融合性态势, 从而将语言内部层面的纯粹语言转换和语言外部或符际因素综合考虑到翻译的过程中, 表现出跨越语言界限和文化传统的特点, 文化的复杂性本质为多学科阐释翻译提供了合法性。语言是文化的内核, 同时也是文化传播和交际得以实现的最重要载体, 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已经勃然兴起。翻译研究亟需吸收多学科相关理论的合理成分, 完善翻译的多学科定义, 这将涉及语言学、文化学、翻译学、符号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起源于符号, 符号是文化的根基(吴娟、刘建华 2014: 80)。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应该对翻译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一门科学的翻译符号学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既然语言是表意符号系统, 那么翻译就是对语言符号系统的解构和重构, 翻译在本质上是一个符号转换过程。这个过程涵盖了语内因素、语外因素和符号间因素, 这些因素只有通过符号系统才能实现有效的转换、协调和建构, “符号使人得以深入到意义之中, 人对事物的符号化理解是文化积累的前提。人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与认识总是在途中, 总是不完善的、暂时的、动态的。符号学正是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解释研究对象的本质, 提供认知事物的最佳方式, 而这正是符号学方法论威力

的彰显”(吕红周、单红 2013: 20)。

1.2 基于符号学的翻译研究的现状

通过对一个语言符号进行的不同阐释, Jakobson(2012: 127)提出了翻译的三类型: 语内翻译(在一种自然语言内解释一个语言符号)、语际翻译(用另一种自然语言解释一种语言符号)和符际翻译(用非语言符号解释语言符号), 开创了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融合的先河。巴特以《符号学原理》奠定了自己在符号学界的地位, 他的符号学研究有着浓郁的文化色彩, 《符号帝国》就是通过对日本活文化现象的挖掘, 涉及消费、饮食、时尚等生活现象。符号学与文化研究有着较广泛的接触, 以洛特曼为首的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正是植根于俄罗斯固有的民族土壤和地缘特质用拓扑学理论研究俄罗斯民族文化, 创造了文化符号学研究的阵营。Nida(1993: 164)从翻译的交际属性出发建构了社会符号学翻译观, 认为符号的意义可分为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 这种对符号意义的理解直接受益于莫里斯给符号学的三分野划分, 即研究符号与符号关系的句法学、研究符号与对象的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语用学。

在我国从符号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始自1988年的四篇文章, 即罗进德(1988)“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 郑伟波(1988)“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 柯平(1988)“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 张亚非(1988)“符号结构—文化差异—语际翻译”。之后, 李锡胤(1989)发表了“关于文学翻译的思考”, 他认为作品是一个符号系统, 区别了以语词作为翻译单位的差异, 强调了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用。贾洪伟(2005:11)认为这5篇文章拉开了国内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序幕。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涉及符号学与翻译融合研究的文章,如陈宏薇(1996)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介绍了奈达从社会符号学相关理论对翻译的探讨,王斌和王晋瑞(2000)的“从信息论和符号学看翻译对等”涉及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信息等值问题。再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纷纷以符号学的理论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专有名词、粗俗语、电影名称、法律用语、诗歌等。可见,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地位不断得到加强。

从以上文献梳理来看,以往的研究都看到了符号学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局限于采用符号学某一理论解释翻译,停留在脚注式研究,还没能实现符号学与翻译的真正融合。基于此,我们提出将符号转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翻译符号学,这样一来符号成为翻译的单位,符号转换过程的各种因素成为我们要考察和分析的内容。

2. 符号学视野下的翻译

2.1 符号过程

皮尔斯把符号过程理解为一个不可化约的三元关系,即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符号只有经过解释才能成为符号,解释是符号的生命,解释终止之处符号也即宣布死亡。所以每一个符号都具有产生解释项的能力,而每一符号都是借助其他符号进行阐释的。符号过程就是符号解释的过程、产生意义的过程、符号成为符号的过程。把翻译视为符号转换过程,是符号主体对用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组织的文本的解构,经过重新编码创造性地建构成基于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的文本,从技术层面讲至少涉及源文本、源语语言符号系统、译者、译入语语言符号系统、译入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符号转换过程从深层透视意义的内在机理,“符号化的过程把一切都融入自身,符号化的根本是意义,世界因为符号化而从自然世界进入了意义世界,进入了可以被理解和言说的世界。自然因为具有意义而被人所知、所探索,意义是符号的本性所在,人的意义也就通过符号而得到表达”(吕红周 2012: 44)。口译研究者普遍认为迫于时间的压力,译员应选择一些符号和缩略语记笔记,来表达特定意义(毕建录、陈祎 2010: 112)。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在这一点上共识大于分歧,现有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与语言相关的因素展开论述。但我们的思考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层次,因为纯语言转换的策略和方法不能生产出优秀的翻译作品。翻译的内核是语言,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本身就是符号形式与内容的转化,语言文字层面的转化又以再现为主要特征。由于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所以翻译同时也是一种文化间阐释,译作是既不同于源语,也不同于译入语的一种中间形态。这种间性状态最好的诠释了翻译的动态性、生成性和未完成性,与符号生长理论相契合。

2.2 符号生长

每一次阅读都会产生新的意义,都涉及三种符号主体的互动,即创作主体(作者)、翻译主体(译者)、接受主体(读者)。译者的身份更加复杂,他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作的阐释者。任何翻译都不是意义的终结,而是新的对话的起点,这是意义动态性流动的内在要求。符号生长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新意义是如何产生的,皮尔斯从符号解释项的分析得出了符号生长理论。

符号只有经过解释才成为符号,一个符号的解释必须通过另一个符号来实现,理论上,这种解释的过程具有无限性,“解释性符号可以或必须在其自身方面被说明,从而这一说明将第一解释项化为第二媒介,这一媒介是对其自身方面的解释”(王铭玉 2004: 125)。符号生长的本能早就了符号层级现象,“语言是个层级符号系统,每一级的符号总是由能指加所指构成,而它们的复合构成物又作为上一级符号的能指进入新符号的构成过程”(王铭玉 2004: 222)。符号生长理论及其符号层级对翻译研究有着直接的启示和帮助,语言符号系统观认为,系统的意义要大于部分的加和,具有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的意义。符号生长的过程一方面形成了表达式的连续体,另一方面将符号与外界的实际事件、事物或状态联接起来,但是“把符号与其内容进行组接并不意味着生产过程的终结,还需将符号和实际事件进行比较并揭示出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王铭玉,等 2013: 85)。

翻译的阐释过程就是源语文本符号系统的生长过程,跨越语言界限与文化界限就是为了与译入语文化对接,其旨向就是对译入语接受者产生理想的影响并出现一种互动。交际的符号学解释就是交际者应用符号在被交际者身上引起了符号过程。受交际者与交际者可以是同一个机体,比如一个人写给他自己的信。而这种符号过程的交际手段就是交际中使用的符号,交际内容是交际手段建构的交际者与被交际者之间的共有意义。交际的本质就是在交际者和被交际者之间建立一种至少是暂时的共识或者可以称之为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导致了交际者和被交际者的共同化,“语言符号对于一个给定的语言社会的成员是具有某个意义的共同核心的”(莫里斯 1989: 146)这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之间正常的交际得以实现的基础,又称之为个人间性。

2.3 组合与聚合

语言符号意义与形式的非一一对应的属性,允许出现多个符号表达一个意义,一个符号有多个意义的情况,这就存在符号横向组合与聚合选择的问题。原文和译文之间通过词汇层、句法层、文本层等形式层面和意义、修辞、文化的、宗教的等隐含因素的转换建立联系,语义关系通过符号组合和聚合关系得以实现。

(1) He drinks like a fish.

(2) a. * Он пьёт как рыба.

b. Он пьёт как сапожник.

例(1)通过严格的语言编码从英语转换为俄语(2) a,但

在俄语情境中,这种说法是不被接受的,正确的为(2) b,这是翻译过程中常见的语言外因素的影响。语言重新编码不能局限在词和语法概念层,还要以符号过程为背景,考虑文化价值系统。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如何在译入语中不存在对等物的情况下实现文化意象的转换,从而协调原文本与译入语文本的语义内涵是翻译无法避免的问题。

(3) *Море было синее-синее, а небо голубое-голубое.*

俄语中存在两个表示蓝色的词 *синее* 和 *голубое*,而英语中对蓝色的区分需要借助形容词以短语形式来表达 *dark blue/light blue/pale blue*。这源于不同语言棱镜对世界认识的反射差异,语言世界图景理论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阐释。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翻译过程中,语言编码选择受到的限制。语言是层级表意符号系统,“系统不是单位的简单总和,每一个单位都受到关系的制约,因此,系统是单位间关系的总和”(Сыроваткин 1978: 30)。

译入语符号与源语符号的等值是译者的最佳选择,但通常情况很难实现,不对称性是文化交际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于是译者会进行语义补偿操作。符号学中二元对立的方法充分体现在翻译过程中,如原文/译文、组合/聚合、动态/静态、中心/边缘、主题/述题、主观/客观等。这种对立还广泛存在于读者当中,即同一个文本对不同读者来说包含着不同的信息,“文本就像是一个活的机体,每一次成功阅读的信息会随着重复阅读被读者吸收并产生影响”(Lotman 1977: 23)。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是一个主要的现实,意义是社会的产物,即社会创造着意义。

由各种符号经组合与聚合的关系建构的书写文本形成一个独特的符号系统,解释项与人的主观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发挥符号主体创造性的同时也遭遇着人们的质疑。但解释才是符号生命所在,但解释也有自己的限度,“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无非是由于符号的解释者依据一定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规范所作的解释或认知……作为符号的解释者,人所作的解释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共同体的规范决定了符号解释的不自由。解释项是符号意义,允许把一个符号翻译成另一个符号系统”(季海宏 2011: 98)。

2.4 解码与编码

语言符号系统是翻译研究的本体依托,在这一层次发生语言结构的转换,文本是阐释的出发点。经过对源语文本的理解,翻译过程表现为一个符号线性过程:解码—编码—重新编码,这里的解码和编码都是在源语的基础上对信息的获取和组织,而重新编码则是在译入语基础上做出的一种文本建构(见图1)。重新编码的过程除了考虑语言符号层面的因素(如词汇、句子、篇章等),还要考虑语用因素,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行为,“语言交际过程即语言使用者在不同意识程度下顺应交际需要而做出一系列语言选择的过程,而语言选择实现了源于语言选择的三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雷晓峰、田建国 2014: 100)。



图1. 翻译过程的编码、解码与重新编码

译者以源语文本为基础展开理解,此过程还考虑到作者文本创作过程的三个情境即语言、交际目的和文化。译者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无法实现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精确把握,作者和文本不再是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行为,因此,翻译就是对文本多种可能意义的选择。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解构是抽取信息的前提条件,而对信息的提取具有客观和主观双重性特征,即源语文本的多义性和开放性。

为了把意义限制在可理解的范围,译者需要对作者创作时的关联要素进行考虑,如语言情境、交际情境和文化情境等,但这并非全部。意义永远都不是精确的,这为译者的创造和阐释留存了空间。我们不能过度的拨乱反正,作者中心论或译者中心论的争执无益于解决任何问题,既然意义是动态的建构过程,那么任何的适度阐释都有其合法性。作者中心论会扼杀意义的生命,译者中心论的阐释会是在无源之水的臆断,我们只有正视作者、译者和读者等要素在意义阐释中的主体地位才能看清这种互动和主体间性。作者的目的在于意义的表达,译者的旨向在于意义的转换,“翻译文本系统在其内部的原文和译文两个文本之间,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保持一种同源不同一、相似不相同的辩证对等关系。翻译是一个对原文的理解与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意义理解和重构的过程”(李建红 2014: 83)。

2.5 符号模式化系统

在人—符号—世界的三元关系中,符号是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手段,而由各种符号建构起来的符号系统则是人类认知的结果。语言系统是索绪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索绪尔对语言本质以及语言单位间关系的考察都是以语言系统观为指导原则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层级符号系统、多维的关系系统、纯粹的价值系统”(吕红周 2010: 58)。洛特曼的符号模式化系统是对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的发展和延伸,他把自然语言视为第一模式化系统,“是人类描绘世界的语言图景,人类用语言提供的模式了解和表现世界”(王铭玉 2011: 105)。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符号系统,如文化、宗教、科学、艺术、历史、神话等,为第二模式化系统。

符号模式化系统把复杂的文化现象纳入符号学视野,将语言符号系统和文化符号系统建立起内在的关联,在承

认两者具有同源、同构的内在机理的同时,又不将其简单化,强调其差异性和异质性。如语言符号系统的第一性、工具性、单语性,文化符号系统的派生性、先验性、多语性等。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具有多种原因,就符号学来看,文化是各种符号文本的集合,这些文本间处于动态的互动过程,即文化不是静止的,既有主流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影响,也有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渗透。纯粹性和精确性在文化符号系统中逐渐被模糊性和多义性取代,平衡和协调是其理想的运动归宿。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动态观符合文化发展的实际,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固守民族文化主义的排外倾向难以适应当前的现实需要,忽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不是明智之举。

2.6 符号域

符号域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总和,体现在各种领域的文本符号系统的动态相互作用所生成的各种关系中。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不同文本符号系统的地位是不均衡的,这种多元关系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翻译活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各种符号系统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样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交际和转换才成为可能。人对符号的依赖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中,人的本质得以界定,那就是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生活在符号的宇宙中”(吕红周、单红 2013: 22)。

洛特曼把文化视为各种符号系统的集合,而符号域又是人利用文本符号系统进行文化建构活动的结果。翻译活动要立足于符号域之中,只有这样,翻译这种特殊的符号交际行为才有成功的保障,“符号主体之间处于一种交际、平等、合作的双向和多向关系的对话之中,前台是符号编织的文本,后台是符号主体对意义的编码与解码,是与他者主体达到视域融合的努力”(吕红周、单红 2013: 22)。翻译除了传达作者的价值与观念,还不可避免的带有译者的色彩,翻译就是要实现这种意图、目的的成功移动,“交际的效果取决于受话者对编码的最大关联程度上的解码,即言说主体与受话主体间的动态协调过程。言说者与受话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主体与主体间性以符号为联接纽带,以交际活动为润滑剂建构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吕红周、单红 2013: 22),只不过翻译超出了一种语言的意识形态,成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达到互相理解的中介。

3. 结语

古人有“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的深刻认识。翻译活动的跨语言、跨文化的特质注定了其复杂性,翻译基于语言但又要求语言无法表达的文化信息、风格等能得以最大化表达,所以任何囿于语言的探讨都不可能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翻译符号学将汲取翻译学、语言学、符号学、生态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营养,以超学科为自

己的发展方向,必将为翻译问题提供有效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门新兴的翻译符号学正在酝酿和成长中,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之下,翻译研究会取得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 本文得到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铭玉教授与首都师范大学贾伟副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2012: 126-131.
- [2] Lotman, Y. *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7.
- [3]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4] Сыроваткин, С. Н.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в аспекте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лингвосомиотики [M]. Калинин: Калин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8.
- [5] 毕建录, 陈 祎. 交替传译笔记实例分析与启示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4): 109-113.
- [6] 季海宏. 走出符号的围城: 纵谈皮尔斯符号学研究及其产生的问题与出路 [J]. 俄罗斯文艺, 2011(1): 96-100.
- [7] 贾洪伟. 从符号学的语义观看文化翻译之文学语言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8] 雷晓峰, 田建国. 语用顺应论框架下的隐喻翻译模式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4(2): 99-103.
- [9] 李建红. 从文本到互文本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4(1): 79-84.
- [10] 吕红周. 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0(4): 57-60.
- [11] 吕红周. 隐喻生成机制的符号学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2): 44-47.
- [12] 吕红周, 单 红. 语言符号的主体性反思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1): 19-24.
- [13] 莫里斯. 指号、语言和行为 [M]. 罗兰 周易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14] 王铭玉. 符号的模式化系统与符号域: 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研究 [J]. 俄罗斯文艺, 2011(5): 103-108.
- [15]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6] 王铭玉 等. 现代语言符号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7] 吴 娟, 刘建华. 后现代符号经济《达·芬奇密码》的符号阐释及文化救赎 [J]. 外语教学, 2014(5): 80-84.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认知语义学视野下的英汉谚语对比研究”(项目编号: 12YJA740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寇福明, 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英汉对比。

吕红周, 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符号学。

收稿日期 2016-06-29
责任编辑 石春让